

革新与再造: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发展 与社会转型相关问题纵横论*

□ 何一民

摘要:新中国建立初期(1949~1957)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经历了百年的苦难后,在新型的现代化领导集团的引导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本文从城市政权重建与城市管理、工业化与城市发展、城市规划建设的革新与发展、城市化的新起点、城乡关系的重构、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变迁、城市主要社会问题及其治理等七个方面对此一时期中国城市的发展与社会转型进行了全景式地扫描,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若干富有启发性的观点。

关键词:新中国;城市;社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12)01-0082-11

20世纪50年代,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历史发生了伟大的转折。从19世纪中叶开始启动的现代化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畸形发展阶段后,终于在新型的现代化领导集团的引导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城市成为发展现代化的中心和重心。饱受创伤的城市奇迹般地得到恢复和发展,新的城市政权建立,城市管理体系重构,城市工业得到高速发展,城市化在工业化的推动下也出现一个新的发展高潮,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规划和建设也发生巨大变化;由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城市居民的生活发生巨变,旧中国遗留的各种社会问题也得到解决,这在旧中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在当时世界各国也是难以办到的。有关此一阶段的

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的问题甚多,本文仅就以下几个方面略作探索。

一、城市政权重建与城市管理

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城市受到包括史学家、社会学、政治学家在内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青睐,并且日益成为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的切入点。同时他们在进行此类研究的过程中也逐渐认识到纯粹的城市现象是不存在的,从而逐渐跳出了“就城市研究城市”的窠臼,放宽了眼界。作为研究的取向之一,就是加强了对城市管理的研究,并以此深化对城市的认识。实际上,城市管理是城市正常运行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也是城市发展的关键环节。城市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

* 本文为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07JHQ0044《革新与再造: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何一民,男,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所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各项要素,都是通过城市统治机构实行的城市管理,来达到正常的运作,从而使城市朝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城市管理是城市的大脑和中枢。城市管理是城市发展到一定时期自然形成的产物。城市的出现在于它有着特定的社区集散中心功能,而城市行政管理的本质或主要目标就是促使城市功能的充分实现。对此马克思早就给予了明确的肯定,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一句话,就是需要公共的政治机构。”^[1]城市公共的政治机构就是城市管理的实施机构,也就是城市的政府行政管理机构。

目前学术界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管理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所发表的论著主要是从行政学、管理学角度进行分析,着眼于历史研究的相当少。处于重大转型时期的新中国,在社会性质、经济机构、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都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变革,而城市成为这场变革最主要的舞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城市管理面临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城市管理机构和人员等迫切问题;在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新的城市政府还面临着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城市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如何完成维护社会稳定任务,恢复经济发展等众多的重大问题。新中国的城市管理形成于建国初期,完整稳定的城市管理体制一旦形成,就发挥了巨大的效用,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新中国建立初期建立的城市管理符合当时特有的历史条件,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情况,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并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城市管理体制。1949~1957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极为关键的转型期,中国社会性质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转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随着社会性质的变更,社会各个层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则是这些变革最重要的载体。随着社会性质的改变,城市管理的客体——城市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也呈现出显著的不同;这就要求城市管理的主体——城市政府不断调整自己的管理机构、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

和能力,更好地对发展变化中的城市管理客体进行管理。

城市管理机构作为城市管理的关键环节,在这场变革中发生了怎么样的变化,对中国城市又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和社会其它因素又有怎样的联系,这些都是此一时期城市管理研究的重点之一。再现当时中国城市转变的历史,从当时的角度去感受和理解它,以更加客观的认知去解读那段历史。深入分析新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建立,通过对这一时期城市管理体制的探索,总结其经验及教训,特别是对中国城市管理的弊端进行追根溯源,进行深刻的剖析,避免停留在表面就事论事,才可能为当前中国城市管理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城市管理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段的变化。

第一时段是军事管制时期。这一时期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处于混乱状态,当时的城市管理内容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和稳定城市的社会秩序,为此当时的城市政府主要通过四个方面的措施来完成这一任务:第一,城市政府对旧政权进行接收;第二,对旧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处理;第三,利用多种方式致力于城市社会秩序的恢复;第四,开展稳定物价的工作,赢得市民的信任。

第二时段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此一时期城市管理的中心任务是重新建立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稳固新生的城市政权。为实现这一目标,城市政权在原有的机构设置基础上,依据城市管理的需要重新构建,城市管理的主要工作分为三个内容,首先是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其次是加大城市的市政管理力度,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卫生状况和城市的环境;此外就是推进城市文化教育发展进程。

第三时段是一五计划时期。这一时期的城市管理的任务是,城市政府提供一切有利条件为城市的经济建设服务。为此,城市管理的主体进行了更新,形成了城市党委、政府、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政协四大管理班子,共同进行城市管理工作。基层政权组织设置也进一步完善,形成区政

府——街道办事处、公安派出所——居委会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模式,共同对城市居民进行最直接最有效的管理。

总的说来,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城市管理发展呈现出如下三个特点:一是体现了城市与国家高度统一的发展历程;二是新中国的城市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在八年之中均有显著的提升;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管理体制,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雏形。

综上所述,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下,现代意义的城市管理体制在中国初步建立,并为以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建设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今中国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二、工业化与城市发展

20世纪是中国由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变的重要世纪,作为一个区域或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空间载体,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发挥着难以替代的核心作用。

1949~1957年,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贯彻“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和集中力量重点建设工业城市的城建方针的前提下,中国城市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城市工业建设与发展取得了有别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显著成就,同时也渐显出中国工业建设与城市发展的新模式。值得注意的是,1949~1957年,在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起步的同时,工业城市获得稳定快速发展,但也由此产生了一些不利因素,衍生出种种有悖于工业化和城市持续发展的弊端,而这些因素尚未在当时的中央高层形成共识,故未能采取积极正确的调整改革措施。如何从历史视野的角度,把握和认识新中国建立初期工业城市的形成发展和功能演变的内在动因,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工业城市的发展状况、区域布局、演变特点等诸多变革,剖析重工业战略与工业城市发展之间相互交织的种种关系,探索新中国城市发展轨迹,就成为城市发展史命题中应有之义。

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

战略。在中央政府主导下,中国开展了大规模重工业建设,并颁布了为之服务的一系列政策、制度,从而改变了中国城市的职能,现代工业城市由此而兴。

“一五”时期,中国工业城市的形成主要是依托既有城市或城镇,沿着“消费城市——生产城市——工业城市”的发展路径,经过改建、扩建而来,真正平地起家的新工业城市为数不多,不及全国城市总数的5%。传统城市是新中国工业城市形成的“母体”。在以纠正消费性大于生产性为目标的“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城市改造运动,和以城市为基地的工业化建设等城市发展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传统城市的原有生产职能不仅得到增强,而且源于新工业项目的建设又被注入了新的、强大的现代工业生产职能,在此基础上强化了或者形成了城市既有的及新生的多种职能。总之,工业化推动了传统城市的结构、功能不断更新,使城市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职能强度都不断提高;并使传统城市在向工业城市的转变中产生了巨大的聚集和辐射能力,城市以工业职能为主的经济功能得以扩大,其经济腹地也得以拓展,从而拉动城市工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继续发展,进一步推动包括工业职能在内的城市经济功能的多样化和城市工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这就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传统城市与工业城市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工业城市形成的主要模式。

工业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新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运动的结果。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市化,是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五”时期在全国新建了七大新工业区,这七大区域性工业生产基地就是“由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诸工业枢纽、联合企业、联合组织、工业中心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这些区域性工业生产基地实质上就是城市——以城市为中心进行布局和建设。如此,重点工业项目建设和城市规划建设就发生了紧密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关系。因为一个重点项目的建成,不仅需要解决工业生产的动力、能源、原材料、运输、基建等生产性建设内容,还需要解决职工生

活、文化、娱乐、教育、福利等一系列的非生产性建设内容,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又需要以城市为载体来进行资源的集中配置,和各类辅助部门的相互协作;所以在城市新区,一个工业点的出现,往往就是一个城市的雏形。建设一个大型骨干项目或联合企业,一般都形成一个几万、十几万人口的城市。在现有城市新建、扩建重点项目,不仅需要城市提供基础设施及生活服务设施,而且将对城市的性质、规模、职能、规划、布局及发展方向发生重大影响。

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在局部地区的一定阶段内,城市发展也会成为工业化的动力。因此,工业化与城市发展(主要是工业城市)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二者互为动力。“一五”期间,中国工业项目投资集中于内地的部分大中城市,并把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若干个工业化战略推进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聚集中心”和“发展中心”,使城市真正成为带动农村、区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有力地促进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工业化的推进为工业城市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动力,而工业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又为工业化向着更高层次和更深广度提供了载体和中心基地。于是,工业化的持续深入同工业城市向现代化方向的进发,形成了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共同发展的关系。

经过“一五”时期大规模建设,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以工业城市为主体的现代城市体系。基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作为重工业发展的先行部门和基础产业的能源、原材料工业以及相应的加工工业,理所当然就成为了新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最重要的部门之一,由此形成了一批以重工业为主的重型工业城市,这类城市是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所必须依托的基地和载体,并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再加之配合工业化而进行城市建设,决定了重型工业城市是城市建设的重点并体现着新中国城市发展的主体和演进方向,这就更加强了重型工业城市作为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发展的主题所在和

重要意义。

三、城市规划、建设的革新与发展

城市规划是城市政府为了实现一定时间内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城市空间布局 and 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2]。城市的规划建设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城市规划建设的历史研究是城市史学所应包括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城市正面临发展的新形势,2001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37.7%^[3],根据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化已经跨入了加速发展的新阶段^[4]。在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许多以前未曾遇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将层出不穷,许多前人未走过的路需要去探索,许多重大历史课题将需要去解决,乃至许多工作都将需要重新认识、重新谋划、重新实施。过去的发展不仅为今天的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许多过去促进或阻碍其发展的因素,今天或多或少仍在发挥作用。迫切需要总结城市发展所经历的曲曲折折,迫切需要把付出了巨大代价得来的经验教训用之于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实践。

新中国建立初期,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新中国城市规划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国各级政府规划建设了大批城市,形成了今天城市的基本格局,许多城市的道路干道骨架延续至今。事实上,今天城市规划所处理的对象中,大部分内容仍然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成果。另外,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源于苏联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做法,也一直影响着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城市规划事业的发展。因此,对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建设进行分析和总结,弄清楚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规划事业启动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问题、经验与教训,不仅对我国城市史和城市规划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对当前城市规划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研究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建设,必须将其置于历史的时空之中,通过对这一时期城市

规划理论、思想乃至规划内容、方法、技术、制度演变的探讨,认识和把握这一问题的时代性、特殊性及其经验教训,必然有助于中国现代城市规划的理论研究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理论体系。

城市史学的综合性与城市规划本身的综合性决定了城市规划建设史研究方法的综合性与多样性。基于本选题的跨学科特性,因而相关研究必须在结合城市史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和要求之上,综合运用历史学、城市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立足前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图片与文字的手段,从一般理论到具体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个案、从特点到问题等不同层面,对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城市规划建设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总结,以期较为全面地揭示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城市规划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特点问题、经验教训,以及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四、城市化的新起点

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联合国在总结了世界发展趋势后认为,城市是人类社会迄今发展的最好的居住方式,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其发展对于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20世纪,被称为全球城市化的世纪、城市的世纪。21世纪,世界城市化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世界上约有30多亿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有些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将占总人口比重的70-80%。城市化又一次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和新的发展热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更是如此。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化构成了全球城市化的重要部分。据预测,202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也将超过60%,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将形成协调发展格局,城乡一体化将取得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成就,城市将成为区域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战略中心。因此,中国已走过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正在走的和即将继续发生的城市化变迁,无疑引起全球的注意。未来20年内中国城市化进程将对全球发

展产生深远影响,许多国外学者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世界银行在《2020年的中国》中开宗明义:“当前的中国正经历两个转变,即从指令性经济向市场性经济转变和从农村、农业社会向城市、工业社会的转变(世界银行1997)。”在新经济学里,人仍然是财富之父,城市却成为财富之母,财富之母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地。因此,健康的城市化是中国实施新三大战略步骤的重要保证。伴随着改革深化和开放扩大,中国正实现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的转变。城市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潮流已不可逆转。现在不是需要讨论是否应该推进城市化的问题,而是如何把握城市化规律,结合国情,促进城市化的健康持续和快速发展的问題。借用发展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话,“问题不是城市化进程是否会发生,而是它如何发生,亿万中国人今后几十年的生活水平将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在2000年10月11日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已明确把“稳妥地推进城镇化”作为我国“十五”期间必须着重研究和解决的重大战略性、宏观性和政策性问題。党的十六大第一次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明确提出了“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的战略方针,并引人注目地首次为我国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指明了方向,即“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和“城镇人口的比重较大幅度提高,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扩大化的趋势将逐步扭转”。^[6]2004年2月,温家宝总理则将“坚持城乡协调发展”作为新世纪科学的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重申。^[7]并且相继提出了新型城市化、可持续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统筹城乡社会发展等城市战略。

诚然,与一切事物的发展轨迹一样,城市化进程与城市发展也不会一帆风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城市的发展将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可以说,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城市的可持

续发展已成为我国在21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世昌则言昌,言昌则才愈昌。”21世纪将是人类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将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代,也必然是中国城市思想及其理论体系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

在21世纪开始之际,反思中国城市化进程发展的历史轨迹,科学分析发展现状,总结经验和教训,憧憬新世纪中国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美好未来,探讨面向21世纪的城市化战略,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城市化,对于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促进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有序、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化的研究就具有如此意义。

20世纪哲学大师、德国人施本格勒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曾指出: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中产生的;一部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而具有普世性的现代化大潮,则更使人类社会和城市的历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农业革命使城市诞生于世界,工业革命则使城市主宰了世界。城市作为一个具有组织能力、功能齐全、能量巨大的有机体,成为融化、更新、创造新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造就优秀人物和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大熔炉,成为民族的、国家的乃至国际社会的中心,成为社会各领域所有革命性变革的中心。世界现代化普遍历程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由大城市反哺和带动周边地区和中小城市;以大城市为中心,日益密集的大小城市组成城市圈和城市带,它们最终将吸引全部人口并覆盖整个乡村。人造城市,城市造人,人和城市造就城市文化。城市盛衰兴亡的历史命运,构成了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宏观轨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成为了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激动人心而又发人深省的一页。中国经历了与众不同的城市化过程,具有相当的独特性。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在亚洲的崛起以及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别具一格,学术界对中国城市化研究成为新的热点,有关中国城市化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8]。

五、城乡关系的重构

城乡关系主要指的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关系,包括城乡间的政治、经济、人口、社会文化、技术等多方面的相互关系,其本质是城市和乡村两个地理单元之间、两种不同居住形态之间实行有效的资源配置和流通问题,其中最根本的当属经济关系。另外,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是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没有粮食,城市居民也无法生存下去。城市离不开乡村而且要继续依靠乡村,工业离不开农业,并要以农业为基础。毫无疑问,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彼此促进的关系:城市和乡村的任何变化,都可以牵动城乡关系格局的变化,而城乡关系的变化反过来又可作用于城市和农村。

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城乡关系的历史。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言:“分工引起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了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运动。”^[9]因此,解决城乡关系问题自古以来就是仁人志士的奋斗目标,也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社会科学者的重大研究课题。而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很好地认识这个问题。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城市受到愈来愈多包括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在内的研究者青睐,并日益成为研究社会发展、人类文明的切入点。其中一个新的研究取向,就是逐步加强对城市和农村之间关系的研究,并以此深化城市发展历程的已有认知。事实上,城乡关系是城市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城乡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城市发展的状况。城市与乡村是人类文明产生以来的两个空间实体,是一定地域中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有机体中的两个方面,尽管彼此在社会、经济、文化、建筑等若干方面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一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每一个城市都是以一定的区域为腹地,城市的规模、发展速度的快慢都与一定区域内的农村社会经济的状况有着直接的

关系。因此,如何很好地协调和处理城市与农村二者之间的关系,常常涉及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战略选择。因此,城乡关系的研究也必然成为,而且应当成为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和拓展方向。早在1991年出版的《近代重庆城市史》一书中,著名的城市史学家隗瀛涛教授就提出了要重视近代城乡关系研究的问题^[10]。随后,学界研究同仁更是在实际研究过程中深刻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无论是方法还是理论、领域都在不断开拓和深入的新兴学科,“城市史研究不能孤立地局限于研究城市本身,而必须扩大研究视野,要在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和研究城市化过程”^[11]。其实,这一认识在国外早已为人所倡,如有人在论及“城市史”学科特征时,就认为:“‘城市史’这个概念是建立在如下观点之上的:城市有其独特之处。如果城市与社会的地方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再把‘城市史’当作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进行讨论就没有意义。无论城市的特性包括什么——无论它是地理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既然明确是城市,其特征就应该使其与乡村区分开来。因此,任何综合性的城市史都应该包括对城乡关系的考察。”^[12]

事实上,城乡关系无论是与城市化还是与城市发展都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我们要拓展城市史的研究领域、深化已有的城市史研究,必然需要加大对城乡关系研究的力度。

近年来,无论是从城市史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史、政治史的角度对历史上的城乡关系进行研究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对古代与近代城乡关系的研究成果相对较丰,对当代城乡关系研究更是汗牛充栋。然而关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城乡关系,学界虽也有人论述,然而存在很多问题和不足。检索现有的研究成果总体观之,大多只是停留在论说“一五”计划时期的城乡关系,而对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城乡关系以及其所具有的过渡性则基本上是点到为止,寥寥几笔带过,甚至略去不言。并且对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城乡关系到“一五”计划时期城乡二元化结构初具雏形的演变过程及其原因,则是有人涉及到却未作深入的探讨。至于对这一段城乡关系对城市、乡村发

展所产生的影响研究则更是无人叙及。基于此,立足城市史的角度,借助丰富的史料,从分析新中国建立初期城乡关系政策,来勾画和恢复新中国建立初期这仅仅8年时间内的城乡关系,并以此作为突破口,藉以从宏观的维度着力考察与研究城乡之间的互动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城市化过程所承担的历史作用,无疑有着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

此外,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深入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众所皆知,城市与乡村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经济社会单元和人类聚落空间,又是相互依存融合竞争的统一体。城乡虽有不同的功能,但谁也离不开谁。城市的繁荣离不开农村的需求和支持;农村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的扩散和带动。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无不证明,随着社会经济进步,必然要求二元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发展,并且这种演进过程的先决条件在于逐步加强城乡关系的互动性和协调性。然而,当前我国城乡发展很不协调:城乡分割、画地为牢,城乡关系互不融通,“一国两个世界”;城乡经济发展两张皮,收入差距越来越大^[13]。同时,由于城乡的物资资源、社会结构、生产手段、生活方式以及人的文化素质的差异,使得城乡处于不平等竞争状态,城市相对于农村在发展上总是处于优势,而农村则处于弱势。这就决定了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在谋划城乡关系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时,要紧紧把握城乡一元化发展观,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及其赖以存在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构建城市和乡村相互兼顾、协调发展的平台,全面建设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小康社会。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明确地向广大党和人民群众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14]紧接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强调“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2004年2月,温家宝总理则将“坚持城乡和谐发展”作为新世纪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重申^[15]。然而,在对为什么要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怎样统筹城乡发展”此类问题不断追

问的同时,我们不得不坦然面对现实中的城乡发展步伐的不一致、城市与农村之间种种“隔膜”以及工农之间存在的并日益加剧的差距。而“现实是由历史演进过来的”^[16],我们在对这一现状的考察中,追根溯源又必然涉及对形成这一局面的历史过程,尤其是新中国建立初期的8年城乡关系做深入研究。所以,理清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城乡关系格局演进的原因及其历程,对照现今的状况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对我们科学地认识当前城乡关系问题的由来和理解统筹城乡发展的内涵,并促成我国城乡关系的现状朝一体化转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六、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变迁

城市居民物质生活的研究,应属于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部分。“随着全球城市化程度的提高,作为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信息中心为一体的城市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和重要,城市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城市社会生活史亦是国际史学界备受重视的研究重点之一”^[17]。

“社会生活,是指人们如何生活的,所反映的是人们在社会中的活动状况。”^[18]如此,城市的社会生活便是指城市中的居民在城市社会中的生活状况,以衣食住行为主要内容的物质生活,是社会生活最直接的表现,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物质外化。不同时期的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建筑、器用等,不但反映了当时物质生活的状况,在精神生活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在对于物质生活进行研究时,不仅是要研究不同时期生活的实际状况及各种生活现象的变迁,还应挖掘隐藏在各种物质生活表象之下的精神文化内涵。

中国的城市史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很多领域取得令人称道的成就,城市生活史作为其中最绚丽多姿的一部分,也吸引了众多学者为其耕耘,和国际上不同的是,中国的学者主要着眼于对本国城市,很少涉及比较研究。

中国城市现代意义上的发展,或者说中国城市的现代化是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

的启动而开始的。现代化的进程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其中城市的现代化包括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一切重要方面,从落后的农业文明状态到向先进的现代文明转变。1949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建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新旧政权交替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出现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新政权的逐步确立,在有意识地对整个社会进行改造和重建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政权建立后,对中国的城市从各个方面进行重建,使得城市焕发出新的光彩,以从未有过的姿态揭开了中国城市发展史的新篇章。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也出现了新的转机。随着城市经济基础、政治体制、管理体系,社会结构等一系列方面的变革重建,中国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也随之发生巨变。

与以往不同的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物质生活的变迁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背景下完成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经过七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新政权完成了对城市社会的重建,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方式、生活行为都发生了与传统大为不同的变化,变化的方式、激烈的程度都是史无前例的。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生活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生活范式被重塑。因而对于这一过程进行深入研究,不但可以深刻的理解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曲线,还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生活范式找到历史的答案,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所言:“不了解城市发展的历史背景,就难以准确地把握和认识当前城市的发展及其问题,当代中国城市尤其是近代中国城市的继承、发展和变革,近代城市发展中的某些规律性因素和条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至今。”昨天的城市生活虽已逝去,但不应该尘封,我们应该从中为今天城市生活各个方面找到原型,为发展城市生活文化提供历史的借鉴,这也是本文的现实意义所在。变迁中形成的城市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是崭新的,城市史学涉足新中国

建立初期城市社会生活变迁研究还不多见,故而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和创新性,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对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城市居民物质生活进行研究,需要从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变迁入手,去发现那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社会的最真实的一面。正如前面所说,研究这段时期城市居民物质生活不仅仅是为了了解该时期的物质生活内容,更重要的是要揭示出这些物质生活变迁和人们这一系列行为下所隐藏的人格动机,以及对整个城市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然而,描述研究城市生活,即便仅仅是物质生活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称:“描写社会生活是困难的,主观记忆常模糊不清,参考材料难免存有偏见或缺乏典型性,城市情况千姿百态,不同阶层,不同经历的人有不同的城市生活,因此,一般的叙述是不可能全面翔实地介绍色彩斑斓的城市生活。”^[19]有西方社会学家认为城市生活的典型特征是高度的差异性和异质性,有人形容城市生活像“一口煮开了的大锅”,因此在研究中会因为研究对象的庞杂而产生一定的困难,有鉴于此,为了更清晰地勾画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城市物质生活,我们认为应采取分层探究的方法,因为这种差异性“大多是人们在社会结构中的角色不同所造成的结果”^[20]。所以根据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结构的特点,应将城市居民分为国家干部及公职人员、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普通劳动者等几个基本阶层,分别描述各阶层的物质生活。

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居民的服饰生活变迁过程十分显著,服饰是社会变迁的晴雨表,在政治因素的主导下,旗袍、西装等民国年间的流行装束被看作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事物被人们所抛弃;以列宁装、干部服为代表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服饰广为流行。其变化的特点是,形成了整齐划一的趋势,各阶层的服饰越来越统一,服饰中的男女性别特征逐渐模糊。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居民的饮食生活被统购统销政策纳入到计划经济体制范围,与此同时,城市居民整体饮食水平有所改善与提高,饮食作风也越

来越朴素化。居住生活的变迁是围绕着国家对城市居民住房的逐步控制调配发生的,在国家调控下房屋出租的租金降低,混乱的租赁关系得到改善,由于公房的配给,普通劳动者的居住条件有较大的改善,城市中普遍形成多户同居的小家庭居住模式。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交通生活变迁相对缓慢、模糊,不过以铁路为代表的现代交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沟通了中国南、北、东、西各地城市之间的交流,但是城市交通生活从整体上看发展很不平衡。在城市内部,尽管现代化的公共交通还不发达,但人力车等较落后的交通工具先于现代化公交系统的发展而在城市中灭迹。

总体来说,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在经济恢复的同时逐年提高,但由于经济增长有限和“一五”计划建设时期的“重生产,轻消费”等政策影响下,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仍然不高。其次在政治力量的作用下,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变迁逐渐纳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轨道,普遍形成社会主义朴素节俭的生活方式。新中国建立初期城市居民物质生活发生变迁的同时,对城市经济、政治、社会心态、传统文化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七、城市主要社会问题及其治理

城市化、现代化,是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主要趋势,伴随着城市化、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社会问题也就相应加剧。中国现阶段正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也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城市社会问题就是其中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城市社会问题是社会问题的缩影,城市社会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城市能否健康、有序地发展,也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息息相关。21世纪以来,中共中央提出要创建和谐社会,其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安定有序,即社会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而要做到安定有序,就必须使各种社会问题都得到妥善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城市社会问题,新政权成功地解决了这些社会问题。面对今天城市里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

题,总结其经验教训,就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城市是社会变迁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就经历了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新中国建立后,在改造已有城市的同时,又建设了大批新城市。改革开放后,根据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的客观实际,党和国家选择了与工业化同步,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发展道路。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大量的人口和社会活动在城市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高度集中,自然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病”——社会问题,这些社会问题的历史如同城市的历史一样久远,可以说自从有了城市,各种社会问题就伴随着其一起生长。无论在什么时代里、在什么制度下,有城市就不可避免地会有社会问题,只不过是不同的时代、城市社会问题的具体表现和严重程度不同罢了。然而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对城市社会问题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一是习惯于将城市社会问题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城市社会问题是由剥削制度引起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消灭了剥削、消灭了阶级,因而就不应该出现阶级社会所具有的城市社会问题,并乐观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是可以消灭一切社会问题的;二是认为社会问题就是社会弊病,是社会的阴暗面,研究社会问题便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三是将治理社会问题与社会改造等同起来,认为治理社会问题就是改造社会,社会改造完成了,社会问题也就消灭了。因而在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社会改造一完成,便认为我国已不存在社会问题了,同时也认为没有必要再研究社会学,各大学也都取消了社会学专业。因为有这些认识上的误区,从而忽略了社会问题的客观性,导致了我国现阶段对于社会问题研究的理论滞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现象已有所改变,除了社会学对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外,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也从不同的角度对相关社会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这些学科关心的是本学科领域内的社会问题,例如政治学研究与权力有关的腐败问题,经济学研究与经济有关的贫困问题、就业问题以及通货膨胀问题等,而法律学则

多关注犯罪问题。社会学虽然对各种社会问题都进行了研究,但也仅从全社会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城市史作为一门以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几乎包括了一个社会的所有现象,城市社会问题也自然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由于城市史学在我国起步较晚,近20多年来,我国的都市史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各类专著、论文都相继问世,但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对近代的一些单体城市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大城市的研究,就专题研究而言也多是政治、经济方面的研究较多,对社会问题的研究也侧重在一些传统的社会问题,理论研究方面还比较薄弱。

近年来,城市社会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特别是转型时期的城市社会问题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目前我们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渡时期,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各类社会问题相继出现,既有早已存在的城市就业问题、也有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问题和“三农”问题。但由于这一转型尚未完成,因而很难对现在的社会问题做出全面的、深入的考察。

1949—1957年的八年时间里,中国的社会制度经历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再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两次巨变;另一方面,不仅城市个数由136个增加到176个,城市人口也由5765万增加到了9949万;而且城市性质和城市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性质来说,城市正逐渐由消费性城市变为生产性城市;从城市结构来看,无论是城市经济结构、组织结构,还是人口结构在这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样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各类城市社会问题也表现得空前严重:城市内物资严重匮乏,物价飞涨,大量城市居民失业,更有大量的难民、老人、小孩流浪街头,加上早已泛滥的烟毒、娼妓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新生的人民政权不得不面对而且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在短短的几年内,不仅解决了近百年堆积的社会问题,甚至解决了数千年来阶级社会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创造了改造城市的奇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不仅需要我們认真研究和总结,

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如果从一个较短的时期来看,新中国建立初期所存在的城市社会问题的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剥削制度的产物;但是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河加以考察,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简单。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被解决的一些城市问题又出现了,如妓女问题、毒品问题、犯罪问题、失业问题等,在中国的大中小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虽然其表现形式和内容与新中国建立初期有所不同。因而这就不得不令人思考,城市社会问题的产生除了与制度有关外,应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和城市自身的性质和功能有关,有些问题的出现是否具有必然性,也就是在城市化与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一些共同的社会问题,换句话讲,城市社会问题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客观现象,它是各种矛盾的产物,是城市内部各要素不协调的结果。城市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的特征,城市社会问题也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城市社会问题的发展阶段不平衡,不同的城市社会问题在不同的城市其表现也不一致。城市社会问题总的来说是因为城市社会内部不协调造成的,它们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对于这些问题的治理也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同时也必须集中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采用不同的手段。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社会问题的治理虽然是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各种社会问题都很快得到抑制,无疑是成功的。但由于当时基本上是采用社会革命的方式,因而使许多社会问题表面上得到了治理,实际上却基本上是治标没治本,甚至使一些显性问题变成了隐性问题,对以后甚至今天仍有许多影响。在城市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究竟该采取什么方式来治理社会问题,这也是今天需要反思的一个问题。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22页。

[2]任致远:《21世纪城市规划管理》,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51页。

[3]王静霞:《团结奋进 勇于创新》,《城市规划》,2003年第2期,第17~21页。

[4]根据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城市化率达到30%左右,城市化过程进入加速阶段;当城市化率达到70%左右时,城市化过程又缓慢下来。城市化的过程呈一条拉平的“S”线。

[5]齐红倩、刘力:《城市化:解决我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关键》,《管理世界》2000年第2期。

[6]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02年11月17日。

[7]温家宝:《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光明日报》2004年3月1日第1、2版。

[8]薛凤旋、蔡建明:《研究中国城市化理论学派述评》,《地理研究》1998年第2期。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90页。

[10]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9页。

[11]何一民:《城市史》,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五十年》,上海书店2000年版,第324页。

[12]周锡瑞著、孟宪科译:《华北城市的近代化——对近年来国外研究的思考》,《城市史研究》第21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13]胡进祥:《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内涵》,《学术交流》2004年2期。

[14]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社,2002年11月17日。

[15]温家宝:《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光明日报》2004年3月1日第1、2版。

[16]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17]熊月之:《稀世富矿: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价值》,《史林》2002年第4期。

[18]李立志:《变迁与重建(1949——1956年的中国社会)》,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19][美]费正清、麦克法夸尔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72页。

[20]康少邦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城市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039)

(责任编辑:张燕清)